



范仲淹、胡瑗与泰州

范观澜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1021年,范仲淹被派至泰州任职。胡瑗因得到范仲淹之举荐为太学教授,历任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官职。胡瑗创建“分斋教学法”(世谓“苏湖教学法”)而名闻遐迩,成为“始于苏湖,终于太学”的教育大家。

泰州,2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大师赵朴初为这座城市撰写的《踏莎行》赞颂泰州为“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

泰州在北宋年间走出了晏殊、吕夷简、范仲淹、韩琦、富弼当朝五位宰相,胡瑗的“分斋教学”使泰州成了名闻遐迩的教授之乡。同时欧阳修、王安石、秦观、苏轼、苏辙都曾把他们的足迹印在泰州的土地上。正由于这一切,众星聚集共同铸就了泰州这座城市的“文昌北宋”之辉煌。

而上述众多的名人中,范仲淹和胡瑗既是泰州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又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和泰州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拥有厚重历史的泰州地域文化,对两人的影响极为深刻,而两位对泰州文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历史记载的北宋泰州五相流芳,文会堂的五贤唱和以及光孝





寺的五贤堂介绍,从不同的角度把范仲淹与泰州文化交融于一起。北宋年间,从泰州走出去了五位宰相,范仲淹与其中的四位有着直接联系,有的是有知遇之恩,有的是有提携之功,有的是风雨同舟之战友,有的则是一度时期之政敌。五贤唱和中的五贤则是范仲淹、滕子京、胡瑗、富弼、周孟阳。范仲淹、滕子京荐举了泰州人胡瑗,范仲淹又美誉富弼,成了一时佳话。光孝五贤堂则是张纶、范仲淹、富弼、胡瑗、王卖见。而张纶支持范仲淹历史上已有口皆碑。胡瑗、王卖见都是泰州本土历史上有名的乡贤。

泰州文会堂的五贤唱和,虽说是文人之间的酬唱应答,却成就了泰州人胡瑗,诞生了“分斋教学法”即“苏湖教法”,泰州即成了远近闻名的教授乡。

为了办好学校,胡瑗订立了严格的学规。起初,学生不遵守学规,范公将自己的儿子纯佑送入郡学读书,拜胡瑗为师。纯佑“尽行其规”,其他学生纷纷效法,再也不敢任意违反。胡瑗在范仲淹的支持下,经过努力,终于把郡学办成当时各地学校的楷模。还有当时朝廷要“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竭力推荐了胡瑗。此时的范仲淹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早年曾在泰州当官。正是由于范仲淹的提携,而使胡瑗成为“始于苏湖,终于太学”的教育大家。近一千年后,翻开历史的长卷,对于范仲淹、胡瑗与泰州文化的研究,觉得更有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曾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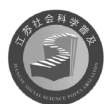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范仲淹与捍海堰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子孙,生于苏州吴县,祖籍彬州(今陕西省彬县),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历任司理参军、推官、县令、秘阁校理、通判、右司谏、知州、都转运使、权知开封府、判国子监、枢密副使,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卒谥“文正”。

范仲淹年幼时忍受了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人生的磨难与勤奋上进联系在一起,总会造就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人才。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取进士,与滕子京、庞籍等位同科,初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天禧五年(1021年),步入仕途六年的范仲淹被派至泰州任职,时值盛年,实践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

范仲淹在泰州任盐官,官名“盐监”,也就是为国家管理盐场,征收盐税。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有时还会出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所以那个时候,盐业、盐利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权安危的重要因素。这样,从中央下派的盐官就非常重要了。

到任后不久,范仲淹就深入盐场,四处视察民情。当他看到海潮入侵,漫过那200多年前唐大历元年(766年)淮南黜陟使李承修筑的捍海堰时,一时间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伤亡,盐灶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又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看到老百姓无以为生、流离失所的场景时,范公忧心如焚。晚间,在油灯下,他连夜伏案疾书,上奏要重筑年久失修的捍海堰。在





那个时代,要想让统治者花钱兴修水利工程很难,但为了民众,范公多次慷慨陈词,争取到他的时任上司江淮发运使张纶,和淮南转运使胡令仪的鼎力支持。张纶奏请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兼任兴化县令,主事修堰工程。他的同事,时任泰州通判的滕子京也给予了大力帮助。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如愿获准施工。

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范公集中了泰州以及通、楚、海共四个州的四万夫役,在一百多华里的海岸线上,合线修筑捍海堰。他亲临施工一线,筹划指挥,又拿出自己的官俸,用于筑堤。史载,一次在施工过程中突然遇到台风,堤堰即将崩溃,民工纷纷逃散,而此时的范公则不顾个人安危,高立于大堰之上,面不改色,指挥若定。在他的感召下,民工们纷纷回转,一起奋力抢修,大堤方才转危为安。

范公修筑捍海堰为民造福,本是一件千古不朽的好事,但是在当时还是遭来非议。刚施工时,因恶劣天气和怪潮,刚筑的海堤多处决口,冻死、饿死和累死民工一二百人,工程被迫停工,有人批评指责,甚至有人打小报告反映到朝廷,诋毁诽谤范仲淹。朝廷派来的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前来实地考察后,积极支持范仲淹的修堤主张,上疏宋仁宗后,方才继续施工。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作为孝子应为母亲尽孝守孝,范仲淹不得已离开泰州。此时,张纶虽然已是功成名就的老者,他依然支持范仲淹,接替了他的工作,任董役即总管并兼任泰州知州。

就这样历经重重困难,终于筑成了这段首起海陵(即泰州),尾接盐城的一条莽莽大堤。该大堤底宽3丈、面1丈、高1.5丈,长143里零136丈。大堤修好后,百姓不再颠沛流离,农业、盐业均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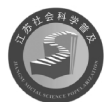
其利。据史书记载,堤堰修复后,“复业者三千六百户,民享其乐”。水利是人民生活的命脉。历史上大禹治水,李冰修都江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许多美好的传说。同样,范仲淹修堰治水在苏北,特别是在泰州一带群众的心目中树立了一座丰碑。人民群众为了怀念范仲淹,把“捍海堰”称为“范公堤”。后来,泰州在海陵前八景中专门把“范堤烟柳”列为一景,让人们永远记住范仲淹在泰州为盐官,筑长堤抵挡海潮,大堤植柳成荫,人民称颂的故事。

文会堂与“忧乐观”

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可以说是代代相传,脍炙人口。文中的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55岁,这是他的人生鼎盛期。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庆历新政”建议。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时代,范公写出了《岳阳楼记》,文中,范公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岳阳楼的景色,真正意图是借题发挥,谈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并由此规劝勉励友人。这个友人就是滕子京。其实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23年前就与滕子京同科进士又同时在泰州为官,可以想象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那时滕子京在泰州修了一座文会堂,范公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文中曰“君子不独乐”,其“忧乐观”即呼之欲出了。

若干年后,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书撰“后





天下之乐而乐”，这跟此前的“君子不独乐”时隔 23 年。两“乐”之间却隐约可见范仲淹一生清晰而执着的思想轨迹：为官一方，无一己之乐；君子一生，先天下而忧。这种“忧乐观”的思想轨迹，泰州，曾是一个起点。

据记载，范公从未去过岳阳，写《岳阳楼记》时，他当时在河南邓州，庆历六年（1046 年）六月十五日，他收到滕子京的一封信并附“洞庭晚秋图”。读信看图时，他想到两人同时考中进士的那种欢欣之状；想起二人共同参与修复泰州捍海堰工程的情景，想起二人共同提携泰州人胡瑗共创苏湖教法的时光；想起两人一同遭遇被贬的现状，一时百感交集，于同年九月十五日挥笔而就《岳阳楼记》。

范仲淹作为一个具有伟大理想的政治家，在顺利时不居功自傲，不骄奢弄权，而是时刻担心国家的命运，关心民众的疾苦，保持清醒的头脑；身处逆境时，不怨天尤人，不颓废沮丧，而是按照自己认定的处世爱国之道，鞠躬尽瘁，激励着自己和同样遭遇的朋友们奋发努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个人沉浮得失置之度外。如此境界，难能可贵。范公的品德一直传为千古佳话。泰州城内曾经建了一座“景范楼”，兴办了一所“景范学堂”，以纪念范仲淹的浩然正气。

如今，文会堂依然矗立于泰州的土地上，堂内“溯滕范相交，赋诗更有岳阳记。论酬唱与共，筑室始于文会堂”的对联再现了范仲淹与滕子京的交往。五贤唱和的石雕再现了当年范仲淹与滕子京等五位挚友吟诗作赋之景象，文会堂前是文正广场，范仲淹青铜雕塑素袍宽袖，蹙眉冷颜，须发飘逸，从容淡定，仿佛在水边一遍遍诵





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胡瑗的苏湖教法

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到苏州任知州,因他向来重视教育,到任后不久即奏请立郡学,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捐出来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因此他专门聘请了胡瑗为“苏州教授,首任郡学教席”。有了范仲淹的慧眼识珠,胡瑗终于找到了一片施展才学的天地。

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故世称“安定先生”,胡瑗因他的祖父胡修任泰州司寇参军,遂举家迁居泰州海陵。他的父亲胡讷很有才学,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胡瑗受到他的影响不小,“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诗书,并立下“以圣贤自期许”的远大抱负和志向。胸有鸿鹄之志的胡瑗总希望能通过科考一举成名,遗憾的是,几次科考,总是名落孙山。

十年苦读,为胡瑗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知识基础,使他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因得到范仲淹之举荐为太学教授,历任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官职。其创建的“分斋教学法”,世谓“苏湖教学法”名闻遐迩。

宝元二年(1039年),滕子京任湖州知州,也同样奏请朝廷在湖州设立学校,获准设立湖州州学,聘胡瑗主持。胡瑗1040年受聘。执教的12年间,他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首创“分斋教学法”,即让学生统一学





习经学,经学就是当时的政治理论,治国安邦的经典,又按学生不同理想志趣和专长,再立治事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政事、数算、文学,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培养学生的实际才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这种分科教育,在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胡瑗在教育实践中,是第一个贯彻范仲淹的政治教育思想的教育家。



皇祐四年(1052年),胡瑗升任光禄寺丞、太学直讲、天章阁侍讲,后以太学博士致仕,胡瑗与当时的孙复、石介二位学者并称为“宋初三先生”。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着较大影响。

胡瑗正是因为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荐,成就了“始于苏湖,终于太学”的教育盛事,从而使泰州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教授之乡。同时,他在浙江湖州兴办的安定书院开创的“湖学”在北宋年间大放异彩。胡瑗因积劳成疾,于嘉祐四年(1059年)经仁宗皇帝恩准,以太常博士官衔东归,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养病。临行时,送行队伍“百里不绝,时以为荣”。他不久病故,终年67岁,赐谥“文昭”。现墓位于浙江湖州南部道场乡青山坞胡峰基幽谷,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瑗在家乡泰州后来有一座衣冠冢。胡瑗当年在家乡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讲学旧址现已原样恢复,再现了胡瑗当年在家乡讲学的神韵。胡瑗在家乡的安定书院与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石鼓书院、鹅湖书院、东坡书院共驰名于中华大地。他在家乡亲手植下的银杏树虽逾千载,但蓬勃旺盛,枝繁叶茂,郁郁苍苍,树干可数人合抱。其主干有枝挺出,状如“慈母怀中抱





子”,可谓“千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象征。

(本稿由泰州市社科联推荐 徐 进、沈 嵘、顾 佳整理)



范观澜,1952年出生,江苏泰州人,泰州市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特约研究员,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管委会文化顾问,泰州市海陵区作家协会主席。多年来致力于佛教文化和地方文化研究。出版专著《中国佛教发展史述略讲义》、《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等,主编《华严文汇》上下册。

